《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第十二期 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研究論文 第69頁 80頁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UMBER 12, Dec. 2004, RESEARCH. pp. 69~80

經濟地理學的制度轉向：一個理論性回顧與研究取向的建議*

楊友仁**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 Theoretical Review and Sugges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by
You-Ren Yang**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經濟地理學領域中「制度轉向」之形成脈絡，並透過梳理相關學者對於制度的定義、其角色的扮演、運作的機制以及演化的過程等看法，提出制度取向下的地方發展研究方向建議。我們認為制度可被視為形塑不同地域經濟發展軌跡的重要中介及產物，有潛力成為理解經濟發展過程中「空間差異」如何產生、如何被呈現的一種方式，而制度取向的地理學研究也有助於理解更廣泛的制度變遷之解釋因素與地方發展之機會與限制。

關鍵詞：經濟地理學、制度轉向、地方發展、制度變遷、制度性綿密、空間差異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xt of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ts implication to local development through reviewing relative concepts of instituti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its influences as well as transformation. We argue that institut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relevant medium that shapes different trajectories of local development and the outcome that been shaped. Furthermore,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has much potential in exploring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 is helpful in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of broader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limitations of lo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economic geography, institutional turn, loc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民國93年9月16日收稿。民國93年11月15日通過。
* 感謝徐進鈺副教授對於本文問題意識的啟發，以及三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聯絡方式：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1號6樓，TEL：0968181352，E-mail：Daniel_Yang@mail.tca.org.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90年代之後，國外經濟地理學界興起了一股「制度轉向(institutional turn)」的熱潮，相關理論性討論以及經驗研究陸續出現，直到今日這樣的旨趣依舊不衰，並且使得地理學者與其他學界(如社會學、經濟學)逐漸展開對話。然而相關學者在這波研究取向的討論中對於所謂「制度」的定義、制度的形成、其角色的扮演、運作的機制以及演化的過程有著各自不同的意見。

基本上我們認為制度轉向的相關討論對於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有著相當大的啟發空間，本文目的在於探討此一研究取向形成的脈絡，以及經由相關理論文獻的回顧就上述各個面向提出個人的看法，最後並總結提出此一取向下之地方發展研究的建議。

二、經濟地理學中「制度轉向」取徑形成的脈絡

按照Jessop(2001)的觀察，經濟地理學中的「制度轉向」有三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主題式」的轉向，第二個層次是「方法論」上的轉向，第三個層次是「本體論」上的轉向。就「本體論」層次而言，制度被視為是經濟生活的根本面向，也就是無所不包，有經濟生活就有制度，所有的經濟行動都是一種社會行動，不能與社會位置、社會性以及權力區分開來。經濟行動是社會地與制度地被放置的，不能僅從個體動機出發，也不能化約為鉅觀結構的內化與制度化，而必須瞭解其更廣泛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政治規則、程序與慣習。如果是對於制度的概念採取這麼根本的理論立場的話，理應老早就出現所謂了「制度轉向」。但我們也觀察到經濟地理學者大致上到了 90年代才產生明顯的研究主題上以及方法論上的轉向，想必是外在結構脈絡發生了一些的改變，才使得經濟地理學界更加重視制度的重要。

對於制度角色之重視以及制度取向的理論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舊制度經濟學」，舊制度經濟學基本上認為經濟過程係作用在一個社會架構中，藉由文化與歷史力量而被形塑，例如Veblen(1919)認為制度是沈澱下來的思考習慣，影響行為，而制度本身也會面臨演化式選擇過程，其與經濟表現是積累因果地相關，影響制度變遷的重要原因是技術的變遷。雖然如此，但舊制度經濟學一般較少討論經濟制度與經濟表現之間的互動關係，新制度經濟學則比較著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產生可預測的行為狀態這個面向，例如Williiamson(1985)即視廠商為一種組織自我交易環境及其外部關係的制度，制度的變遷被視為理性經濟行為的產物，經濟行動者回應相對價格以及交易成本的改變而自主地選擇各種制度，並可以達成「制度均衡」(North，1990)。與舊制度經濟學不同的是，新制度經濟學在方法論上明顯偏向個人主義式的理性選擇制度論，並在某些程度上可納入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益極大化分析，而使其在經濟學領域的運用與影響超過了舊制度經濟學。

經濟地理學之制度取向的一支—調節取向(regulation approach)在80年代是以國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分析所謂的「調節模式(mode of regulation，MoR)」，巴黎學派(Parisian)調節取向提出了「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RoA)」的概念，係指涉一段相對穩定的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其中生產和消費模式可以被順利地組織起來，然而這並非自動地就可以運作順暢，因為資本的積累會產生許多矛盾，例如過度生產、勞動控制與剝削等等，需要能確保再生產的手段，而調節這些矛盾的機制被界定為「調節模式」，例如國家行動、合法性、社會制度、行為規範、習慣、政治實踐等等，一般認為調節模式並非功能性地被積累系統所決定，而是在一種共同穩定(co-stablization)的過程中發展。雖然資本積累的偶然性危機可以透過微調來解決，如改變空間分工或制度轉變，但結構性危機只能透過建立新的積累體制來解決，需要積累系統與調節模式之間新的結構性結合(coupling)，例如福特主義之積累體制與福特—凱因斯(Fordist-Keynesian)調節模式之結構性危機導致進一步的生產國際化，但並未解決危機(Tickell and Peck，1992)。

藉著調節學派的啟發，經濟地理學家逐漸注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制度性結構之重要性，90年代之後這個議題更逐漸浮上檯面，之所以會產生「制度轉向」係伴隨著「區域之復甦」這個命題，其政治社會脈絡是傳統以國族國家為中心的「福特—凱因斯式」政治經濟體制面臨結構性危機。從調節取向的角度來說，調節並支持戰後「福特主義式積累體制」的制度形式在面臨新的「後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的轉變下已逐漸無效，當經濟組織、社會團體以及國家在快速變遷的經濟情勢下尋找新的制度樣貌時，舊的制度框架已被放棄。

在這樣的「制度性調整(institutional fix)」之下，區域尺度之制度逐漸成為一種日趨重要的「制度性空間(institutional space)，區域性制度興起的因素包括：(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隨著市場需求變動以及品質和反應速度越來越重要，「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關係（或者以Michael Storper的話來說，「非貿易性的互賴（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對於競爭力越形關鍵，(2)這些社會經濟關係（協力合作、信任等）為經濟行動者之間的空間鄰近性所強化，(3)這些社會經濟關係被一系列制度所強化，包括非正式的慣習（規則、規範、共享的態度與價值）和正式的公私部門「組織」，這些制度是在區域層次上被生產與再生產，(4)伴隨著國族國家之經濟權力與調節權力的衰退，這些區域性的行動者、社會經濟踐行和制度形構更形重要（Gertler，1999），這樣的區域性制度興起可說是經濟地理學制度轉向的重要脈絡。

三、制度的概念與角色的扮演

對於制度的概念與角色的扮演，不同理論取向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我們先藉由Martin（2000）對於理性選擇取向、社會學取向以及歷史制度論等三種從微觀到鉅觀之不同取向對上述面向的觀點作一整理，以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如表1所揭示的，不同領域的學者對於制度的看法因其專注的焦點不同而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制度經濟學者Rutherford（1994）即認為制度是一種行為的調控機制，或者一種規則，普遍地為社會團體所接受，具體指陳了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為，是本身自我監督或由外在權威所監督，Hodgson（1988；1993）則認為一個制度是一種社會組織，經由傳統規範或法定契約的運作，有助於創造可接受的和例行公事化的行為模式。任何的市場行為是經由許多制度化的規範、預期與慣習以及一系列的內部組織階層和結構，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預測（註1）。在進一步探討制度之形成與作用之角色以前，我們需要對於制度的概念有一個更為全面的理解。

組織社會學者Scott（2001）對於制度提出了以下的定義：制度包含了認知的建立、規範的準則和調控的結構，提供社會生活一定的穩定與意義，制度經由許多的媒介（文化、結構、例行公事）而被運送，並且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運作，反映出調控性的行為限制、規範性的契約責任與預期，以及認知性的分類與認同。換句話說，這樣的理解方式不僅關注於「調控（regulative）」面向，也強調制度在另外兩個「規範（normative）」與「認知（recognitive）」面向上的作用，提供了我們對於制度之角色更廣泛的概念。

「調控性」面向強調制度之規則建立、監督、鼓勵核准行動的調控過程，「新制度經濟學」即由此取向出發，關注在組織與組織次體系的尺度，視經濟行動者係出於自利行為計算著利害得失，基於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與理性選擇理論的邏輯，行動者遵從制度與否的問題是「對我有什麼好處？」，規則之所以被遵行是因為行動者之自利。社會學理論取向的學者對此有著相當的批評，例如Granovetter（1985）批評這是人類行動之低度社會化、原子化、效用主義的觀點，認為行動者的決策與行動並非外在於社會脈絡的原子化般，其有目的的行為意圖是鑲嵌在具體的、不斷前進的社會關係體系中。

「規範性」面向強調影響社會生活的傳統慣例、評價與責任義務，對於社會行為施加限制，但也賦予行動一定的權力（empower）與促進行動（enable），它們指定權利及義務責任並使得行為得到一定的預期性，基本上是基於「適合性（appropriateness）」的邏輯，行動者對於制度的問題是「對我的預期是什麼？」，傳統的制度社會學即由此取向出發，關注在組織場域的尺度，這可以追溯到涂爾幹與帕森斯，認為共享的規範與價值是穩定之社會秩序的基礎，也被批評為是「角色-調控」之決定式的結構化行為或「過度社會化」的，但某種程度上亦可以將行動者視為「適應制度之準則之有理智的人（reasonable people adapting to the rules of institutions）」而具有合理性。

「認知性」面向則強調共享的知識與信念體系，而不僅是準則與規範，做為人類行動之基本方針，其所關心的是「詮釋（interpretation）」以及「意義」，強調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ies）、共同的分類體系、共享的定義，認為這是社會或組織之所以能夠穩定的基礎，演化經濟學即從這個角度出發，在組織的尺度關注於意識的創造與有意義行動的選擇，以對付不確定性。資本主義是經由不斷地技術創新與組織創新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廠商將會面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其中社會制度將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樣的區分是分析性的，實際上制度的這三個面向彼此交織，然而拉出規範性與認知性這兩個面向有助於擴大我們對於制度作用的視野，在這樣的架構下，我們對於制度的看法有了較全面的共識：制度是被集體所接受的信念、價值、習俗與規則，並作為個體行動之限制條件。制度的作用不能被化約為個體的普遍性理性計算，這些個體是被鑲嵌在制度之中，其行動被社會關係、地方制度性文化、會意化的規則以及政治性調控所限制。經濟行動應被理解為經由重複發生的多樣化踐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1　三種理論取向對於制度之作用角色與變遷方式的觀點

	主要焦點	對於制度的觀點	制度的作用	制度的變遷方式	地理學的運用
理性選擇制度論	特定的制度環境如何產生特定的制度安排（組織形式），以及這樣的制度安排如何降低交易成本與經濟效率。	經由交易成本的降低與經濟效率的提高來衡量制度。	經由限制、 資訊或厲行，制度結構了個體行為，降低了交易成本。	被視為市場行為（理性經濟行為）的產物，經由「競爭性選擇」的過程，回應相對價格以及交易成本的改變。	空間聚集與經濟活動的在地化創造了可以減低交易成本的特殊制度。
社會學制度論	理解經濟作為「社會地、制度地鑲嵌」的體系的意義，關注於既有制度如何結構與限制制度變遷與創造的範圍，較不關注於制度變遷。	立基於文化的社會慣習、信任、合作、義務與權威的網絡，制度是凝結了的（congealed）社會網絡。	提供認知架構與意義模組，使得經濟認同與經濟行動得以合法化。	制度性演化是經由集體的詮釋，制度變遷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關乎社會合法性或新的共享認知繪圖的新邏輯。	促進廠商在地鑲嵌之地方特定的正式與非正式網絡、合作與知識轉移（非貿易性互賴）。
歷史（演化）制度論	理解制度結構如何與時變遷，這樣的過程與資本主義經濟之歷史動力的關係何在。	制度被視為不同社會經濟行動者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的互動、衝突與妥協之產物，關注於制度所牽動的不對稱權力關係以及經濟調控與治理之重大制度轉化時期。	制度是社會、經濟和權力關係的一種體系，制度構成經濟活動之調控與協調之架構。	制度是可長期持續的，經由緩慢的添加而改變，並且本身受制於路徑依存與鎖死，是與經濟發展之間互動的插曲式產物。	地方制度體制的本質與演化，以及其在社會調控和地方經濟統理中的角色。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rtin（2000）。

構造所中介，包括來自於法定規則、國家政策、技術標準乃至於非正式的習慣、經營管理的例行法則、組織文化和慣習等等，經濟的成功或失敗也是過去的習慣、例行公事、認知架構與知識架構、創新結構、商業支持體系、組織網絡間關係、企業權力、調控環境和政策等等的產物，調控經濟行動的一系列重複發生的踐行和制度化的規範（包括例行公事、習慣、慣習到政府心態、國家政策和制度性權力）是制度作用的表現，然而這樣的調控機制本身並非固定的或像機器般地運作，而是會受到歷史變遷以及社會性的影響。

四、制度的運作機制與演化過程：North的觀點

坦白說經濟地理學者並未對制度之運作機制與演化過程做出完整而內在邏輯一致的論述，個人認為這方面論述最為完整的乃是制度經濟學者Douglas North，接下來我們就對North的基本觀點作一闡述（註2）。

North（1990）認為制度乃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是人們設定來限制他們的行為互動，包括了人類制訂來規範人際互動之限制的任何形式，一旦建立，就決定各種活動的機會與成本，因此可見North仍舊著重制度的「調控」層面，強調制度作為行為之限制的意義，制度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未必是有效率的），以降低不確定性。而制度的形成則涉及成員的合作，即使激烈的競爭也是在共同合作約定的規則之下進行的。與新古典主義的觀點不同的是，North（1990）認為新古典主義的工具理性和人們建立與遵守約束自己之制度的行為是無法相容的，他因而修正了新古典主義的行為假設，納入了交易成本的根源、訊息處理的能力、意識形態與主觀心智模型等加以考慮，可見他也部分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入了「認知」與「規範」的層面來探討制度的意義。主觀認知之意識形態是人類選擇的重要因素，當面對非人際、非重複性的交換時，關於後果的不確定性就會增加，他強調面對複雜的交換情境，有必要發展出有規律的形態，制度的建立改變了個人為表達自己的價值與利益所付出的代價，導致觀念、意識形態與教條可以在個人選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基本上制度運作最核心的機制仍是制度對行為限制面與調控面的作用， North (1990) 區分出正式規則、非正式限制與執行三個層面，這三個層面對行為的影響過程不同，而形成與改變的方式也不同。界定個人機會範圍的制度限制是由正式與非正式限制共同構成的複雜組合，它們組成互相關連的網絡，其中的各種組合方式決定了不同狀況下的選擇範圍，也反映著衡量和執行的成本。

此外，North也對組織的角色加以界定，如果訊息和執行不需要(交易)成本，則組織就很難有所表現。組織係從制度架構中發展出來，提供人類互動的結構，組織內的成員因某種共同的目標而結合，組織的出現以及其演變基本上受到制度架構的影響，組織在制度提供的機會下降低了成本而促成交易，也形成知識、創新技術，甚至改變談判力量而造成制度的變動。組織作為一個有目的的實體，由其創建者設計，用來在社會制度結構所界定的機會裡追求財富、所得或其他目標，組織(如廠商)在克服資產的特殊性(asset specificity)和契約後之投機行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作為降低經濟活動之衡量成本的措施。組織之創建不僅僅是由制度限制所決定，也取決於其他限制(如技術、所得和偏好)，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組織的形態及其變化會反過來累積式地改變制度結構。簡言之，制度乃是基本的遊戲規則，而組織則具有發動制度變革的角色。

根據新古典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不同的經濟體系經過長時間的貿易後，其制度結構會逐漸趨於一致，如同Alchain (1950) 所提出的演化假說，無孔不入的競爭應該會驅除掉劣等的制度，而使較適於解決人類問題的制度得以長存。但North (1981；1990) 揚棄了以效率原則解釋制度的看法，強調統治者是為自己的利益而設立財產權，而交易成本往往導致無效率的財產權普遍存在。競爭壓力之所以不一定導致無效率制度之消失的關鍵原因在於制度與組織的差異，以及其間的互動，這將引領制度改變的方向，此外影響「最適」制度出現的因素還包括行動者之主觀認知模型的不完全。制度的變遷涉及正式規則、非正式限制與執行三者之間的互動，使得制度變遷總是逐步而緩慢的，而且呈現出一定的連續性，即使正式規則經過迅速而重大的改變，所配合的非正式限制與執行機能只能隨著時間緩慢而逐漸調整。

漸進性的制度變遷是來自於組織中的行動者認知到他們能夠在現行制度架構的某個邊緣進行改變來改善狀況，但認知之內容受限於行動者接收到的訊息，以及處理訊息的方式(心智建構)，由於深植於社會中的「非正式限制」，制度通常是逐步漸進地改變，而非以不連續的方式改變。更進一步地說，制度變遷的過程乃決定於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限制條件都會造就特定的「交換結構(exchange structure)」，而這樣的交換結構會形成特定的誘因結構，而制度變遷則端賴制度所造成之誘因結構中演進而來的「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所形成的「鎖進效果(lock-in)」，以及人類「認知」與回應機會變化的「回饋過程」。而所謂的「鎖進效果」則來自於制度架構中的組織互動衍生出「網絡外部性」，有可能形成制度網絡的「報酬遞增」特性，但也有可能實際報酬遞減，產生負面的外部性與「鎖死」現象。

五、經濟地理學的制度取向研究相關主題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對於制度的形成與角色扮演、作用的機制與變遷的過程有了基本的理解，就經濟地理學而言，制度轉向在理論層次上的討論可以進一步延伸到以制度研究作為理解不同地方經濟生活的方法論，制度作為形塑不同地域經濟發展軌跡的中介及產物，成為理解經濟發展過程中「空間差異」如何產生、如何被呈現的一種方式，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地理面向有可能成為更廣泛的制度變遷的重要解釋因素。

在這樣的認知之下，相關國內外學者已經展開不少都市與區域發展的經驗研究，參考Martin (2000) 的見解，我們認為經濟地理學之制度取向的研究主題至少有以下六個面向的發展。

1. 界定形塑不同地域經濟之不同種類制度的角色

例如Martin (2000) 就參考經濟學者的定義區分出「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前者包括非正式的慣習、習俗、規範和社會例行公事的體系以及正式的規則與調節的結構，以限制和調控社會經濟行為，後者指的是特定的組織形式，例如市場、廠商、工會等等，源自於制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環境、由制度環境所管控。經濟地理學的制度取向應該關注於這兩者在特定地域所組成的「體制（institutional regime）」，以及這兩者之間的互動，以理解不同地方經濟的本質。例如楊友仁、王鴻楷、郭健倫（2004）即以這樣的架構分析中國大陸蘇州地區土地產權體制的轉化，指出中國大陸不同政府層級之間特殊的政治經濟指標體系對於地方產權體制轉化的影響。

經濟地理學者也發展出「制度空間（institutional spaces）」的概念，有助於這方面的討論，這指的是特定的地理區域中某個制度被建構並產生有效的影響力與影響範圍（Martin，2000），可以進一步界定出制度空間的階層性，例如國家制度空間以及地方或區域制度空間，這些制度空間的「套疊（nestedness）」（接合、互動和連結的模式）在每個地方有所不同，產生不同的「地方體制（local institutional regime）」，就這個面向進一步分析可以探究多種鑲嵌在不同的制度結構中的國家（或地方）資本主義模式（Smart，2000）。我們認為納入「尺度（scale）」這個經濟地理學的重要概念有助於幫助探討制度變遷的過程以及其所牽動的作用力（註3），在以North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對於制度變遷的分析架構中若能夠進一步掌握不同「制度空間」所牽動的行動者、組織與制度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的話，將更有助於理解特定空間尺度下之制度變遷的機制。

2. 探究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何「地理地」產生差異

不同的「地方體制」在不同地方發展、演化，與地方經濟活動互動、互相強化，如同 Hodgson（1993）指出，規範、預期與慣習是被設定在歷史地與地理地特殊調控機構中，在地方與區域尺度，制度的路徑依存效應特別明顯。經濟地理學者要探究的是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何地理地產生差異，例如探究「區域性鎖死」現象（Grabher，1993），一個地方性的制度體制如何陷入常規中，使得關乎創新的生產文化以及統理慣習對於萌生的經濟環境不再產生作用。

當既有制度結構對於經濟活動產生阻礙時，政治與經濟行動者會尋求新的制度性調整，不同經濟行動者之間以及新舊制度之間產生矛盾與衝突，社會經濟作用者之權力分布（分配）是這種互動的重要面向，無效率的制度可能繼續存在，而新的制度可能建立在既存的制度基礎之上，對此 Setterfield（1997）進一步提出「制度磁滯（institutional hysteresis）」的概念，指的是既有的制度會影響目前的經濟行動，而目前的經濟行動又會影響接下來的制度形式，這個模型指出一定時期的制度的穩定性，不時插入顯著的制度變遷。例如 Grabher（1993）就指出舊工業區域中的強社會聯繫可能成為強有力的結構性弱點，阻礙了經濟再結構與更新的過程，例如德國 Baden-Wurttemberg在全球競爭下就面臨制度僵化與高社會成本問題，相反地，其他的地方制度體制可能更為「彈性」，可以較快地適應新的產業發展情境。由於制度所賴以形成的建構要素是彼此互相依賴的，一個地方性制度形構（例如中國大陸的「地方產權體制」）可能拒絕改變，不同的區域發展模式可能產生不同的制度磁滯，制度變遷因而具有特定的地方面向。

經濟地理學在以上這兩個面向的研究相對較少，楊友仁、王鴻楷（2001）初步歸納出關於9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地方產權體制轉化的假設性命題可補充做為參考，當中的主體並非原子化的個人，而是地方政府，解釋地方產權體制轉化的起點並不是效用最大化之個人選擇和市場普遍存在，而是地方政府在各種約束條件下追求交易成本最低與效用極大化的制度選擇，其中市場競爭的機制與產業組織中的監督管理比起產權制度來說是更為重要，基本上這裡對於地方政府之角色的設定就是 North（1981；1990）所謂的「制度創新團體」，對於「掠奪性地方國家」模型中的「腐敗（corruption）」的問題則可納入約束條件中加以考量，其中「地方競爭」是所謂「地方主義」論述以及「邪惡假說」所必須考慮的一種重要約束條件（註4），除了預算限制強化、財政投資競爭等機制可以納入這個命題作為約束條件之外，他們也強調從地域性研究（locality studies）取向下的「空間差異」應作為一種約束條件（註5），其對於地方產權體制轉化所產生的作用值得進一步探索。

3. 解釋在地化的技術變遷與技術學習的動力因素

某些地方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例如開放的企業文化、支援性的調控機構與推廣機構、研發取向的大學、以及在地的金融體系）被視為對於促進技術創新與學習更有作用，經濟地理學者關注於揭示技術創新與技術擴散的空間—制度基礎，而這樣的制度動力通常被視為最有可能在區域性的尺度發生，這個部分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不同於制度經濟學與組織社會學者的若干見解。

Cooke and Morgan（1998）強調基於信任、相互學習、共享之目標等等關係性資產的技術地域（technology district），作為社會經濟行動者之企業間網絡的存在使得在地化的學習以及知識產生可以發生，而空間的共現（co-presence）以及區域聚集體提供這樣的創新最適當的條件，地理的接近、可及性以及空間聚集提供知識流動、學習和創新的重要促進因素。Morgan（1997）指出研發創新是經由許多不同的制度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例行公事（institutional routine）和社會慣習所塑造，在這裡指的制度是「重複的行為模式—習慣、慣習與例行公事」，有助於調控經濟生活，減低不確定性，例如商業制度的核心就是生產例行公事，在其中具體化了會意化之知識的習慣行為模式，例行公事和慣習對於創新經濟行為的重要性可以由 Putnam（1993）的「社會資本」概念來總結，也就是促進彼此利益之協調與合作的社會組織的特徵，例如網絡、規範和信任。

另一方面，Scott、Cooke、Morgan等人都強調檢視新工業空間中的社會鑲嵌關係經由地方自發性協會的中介而補充，基於廠商間的協調和合作建立「地方伙伴主義（local associationalism）」，創造區域性「認同」、制度性合作的機制以及知識／生產的相互協力網絡。Cooke and Morgan（1998）提出「伙伴經濟（associational economy）」的觀點來界定全球生產、競爭和政治秩序的新形構，其中中介的組織（例如企業網絡、貿易協會、工會、市民團體等等）對於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乃至於政治穩定扮演了重要角色，指出區域經由一個包括貿易協會、商會、研究中心等等組織的鑲嵌網絡而被統理，這些組織的集體智能、理解力與訊息制度化了經濟行動者之間的信任伙伴關係。特定地方性制度（如商會、貿易組織）有潛力與能力去促進共享的團體認同感，強化地方企業的聲音，志願性的地方商業協會在非正式的商業消息以及合約與行銷網絡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只是公私部門在市場預測、教育訓練、技術轉移上的合作，而且區域尺度可能是最適合、最能夠管理並具有在地敏感性的社會組織層次，也是經濟發展政策最能夠施展的層次。

就這方面的觀點而言，經濟地理學者強調區域中的許多組織性行動者間的密切互動構成了區域性制度的內涵，如 Saxinian（1994）指出大學、企業協會、地方政府、專業社團等等的組織，構成了制度的地理建構面，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區域化聚集的經濟活動也會受到當地之制度結構的制約，並形成本身的組織性、地域性文化、非正式規則與社會鑲嵌網絡，以及所謂的「創新氛圍（innovation milieu）」，在特定地理侷限中的非正式社會關係網絡能經由合能與集體的學習過程促進地方創新能力，創新氛圍的作用在於提供了信任與觀點趨同的機制，超越廠商的競爭界限，能夠討論共同的技術問題、互相學習、集體求解。這也對於地方經濟發展政策上提供了新的思路，亦即建立區域性的制度結構，它們的原則是開放的、相互連結的（associationist）、反身性的、並植基於地域之社會關係中。

Storper（1997）指出所有的生產體系都會面臨「不確定性」的問題，解決這些不確定性而能夠進入集體行動的方式是透過「慣習（conventions）」的制度機制，它是相對應於這些不確定性關係的參與者之間被視為理所當然、不言而喻的通則、文化與社會性機制，這些慣習組成了「生產世界（world of production）」，使得「身份認同（identity）」可以不斷再生產，區域性生產系統的演化有賴於這樣的「生產世界」，植基於其慣習，在特定的時空下被建構，而具有地域特殊性。Storper（1997）引用了演化經濟學派（evolutionary school）的觀點，來說明技術發展過程的特質以及所謂「非貿易性互賴（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的重要性，他指出基於動態學習的廠商間「非貿易性互賴」產生了區域特殊的「關係性資產（relational assets）」，包括行事規則、例行慣例以及正式與非正式網絡，做為區域特殊的但是就整個生產社區而言是公共的資產，這樣的非貿易性互賴必然是區域化的，這對於工業群聚（clusters）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地方特定的慣習、技術外溢、區域化的生產世界與多樣化的「學習經濟制度」之間有循環關係。經濟行動者只有在規則、程序以及誘因被整合進入日常的慣習與制度化的行為世界中時才能有效地運作。

4. 分析區域與地方經濟體的宏觀社會調節與治理結構對於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調節取向的觀點來看，調節指的是協調、穩定、再生產社會經濟關係的特定體制，是較鉅觀的制度形式，包括貨幣管理、薪資關係、競爭形式，如同調節取向所提出的「調節模式」觀點，以及加上地方特定的非正式社會網絡、文化與傳統等等，形成較廣泛的地方經濟之社會調節體制。

調節模式通常被認為具有國家體制的特質，過去的調節學派也較著重於比較不同國家之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不同，但這樣的國家性「制度空間」不見得是封閉而周全的，而且調節取向中對於新積累體制之全球策略的討論較少（註6），不同制度空間之間的「套疊」可能在每個地方產生不同的地方體制權乃至於地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另一方面，部分經濟地理學者認為不應過於關注於特定區域之間的水平關係網絡面向而忽略跨越不同空間尺度的垂直秩序和階層結構的社會關係，例如國族國家之經由市場「規則」和企業治理或勞工、教育訓練政策之調節模式對於區域性制度的影響，Gertler（1999）即挑戰區域性制度的主流概念，強調其他尺度的調控對於形塑經濟過程與結果仍然非常重要，他關注於不同國家之社會經濟體制（資本市場、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業金融、勞動力市場、勞動關係、雇用關係等等）對於企業跨界投資發展的影響，認為區域尺度的制度特徵以及企業策略的確都對於技術轉移產生影響，但相較之下總體經濟的調控結構影響更大。從調節取向的研究架構而言重點是要檢視區域中互動的社會經濟模式、廠商間連結以及勞動關係、輔助性的制度和政治過程如何調控著地域經濟的發展，值得嘗試用調節學派的所提出之幾種資本主義的宏觀調節機制（包括薪資關係、廠商間的協調、公部門的干預等等）來分析地方經濟空間的制度特質（Gilly and Wallet，2001）。

5. 關注於「制度性綿密（institutional thickness）」的發展過程

經濟地理學者提出「制度性綿密」的概念，想要掌握不同區域之間的「體制」的發展差異，與先前所討論之「制度」不同的是，「制度性綿密」應該被理解為一種「制度化」過程，支持並刺激一種擴散了的企業家精神與發展意識，以及一系列經營管理、組織踐行的模式，並將地域以其所處的制度能力來界定，提供了「地域性作為行動者（locality as agents）」之理論基礎，重點則是環繞著一個共同發展目標（agenda）的地方制度動員與結盟過程（Amin and Thrift，1995）。這樣的制度取向之問題意識就在於：地理地不均等發展過程有多少程度以及是如何被這些過程所發生的制度化結構過程所形塑與中介。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除了提供廉價生產成本以及優惠措施之外，地方發展有怎樣的出路？部分學者認為面對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方聚集，透過地方內部的特質，特別是特定制度條件所扮演的角色，如地方制度性現身、共享的規則、慣習與知識的強度，可以為地方發展提供不同的思考出路。在地與全球是在一個制度化的過程中彼此糾纏在一起，地方啟動結構回應著全球化的過程，而且本身變成全球化過程的一部份（Amin and Thrift，1994）。地方經濟發展與企業策略不僅僅反應企業家精神或者是市場力量，也反應著地方的重要行動者藉著動員「彈性的制度性策略」而形塑經濟發展的軌跡，例如經由適當的組織化支援結構和在地鑲嵌著的「社會資本」，這樣的「制度性基礎（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s）」諸如知識創造網絡、信任、相互性的聯繫，補充著人力資源和硬體建設的投資，這些「關係性資產」也就是「制度性綿密」的核心，被認為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關鍵。換句或說，這個面向的「制度轉向」在真實世界中可以被理解為將制度視為解釋地方經濟發展的因素。

Amin等人認為擁有「制度性綿密」的區域被認為可以有效地支持創新導向的經濟活動，進而嵌住跨國資本。Amin and Thrift（1995）界定地方「制度性綿密」之四種要素，包括（1）制度性存在（institutional presence），一系列組織與制度的共同存在，包括廠商、銀行、發展機構、商會、志願性組織等，這裡的「制度」指的是這些各種關乎社會、經濟和政治實踐之組織的存在，或者以Martin（2000）的區分，指的是「制度安排」；（2）網絡（networks），這些組織之間具有「鑲嵌」特性的互動聯繫存在，包括「強連帶」和「弱連帶」，使得持續的創新行為可以幫助信任關係的社會鑲嵌，個人認為這個現象應該以社會鑲嵌性的建構為主軸，形成相互的組織同型性（isomorphism）；（3）權力結構、支配、控制，不同的資源與權力基礎，有機的聯盟和有效的支配（domination）結構，個人認為重點應該是正式性組織關係的治理、統合力量，以能夠有助於不同利益的整合、減少莽撞的個體自利行為，導向經濟生活的「統合化（corporatization）」；（4）地方共同的企畫（a local common enterprise），以Massey（1993）的概念而言，就是一種關乎「進展式的地方感」的共識建立，而非狹隘、封閉性的地方發展心理結構。總而言之，「制度性綿密」不只是組織與網絡關係的存在，而是制度化的過程、互相認知以及地方普遍的企畫，產生集體化以及經濟生活的統合化，這樣的過程並為地方特定的制度性和文化性傳統所強化。

6. 關注於跨界生產網絡與被投資地區地方性制度的互動

例如Hollingsworth（1997）強調生產組織所鑲嵌之制度環境的獨特性與限制面，認為工業化之歷史過程對於制度結構的影響與以及制度的路徑依存，以及各種制度之間的連結性與互賴性，他主要關注於「生產之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SSP）」（註7）的角色，「生產之社會體系」是一種複雜制度的形態，包括廠商的內部結構、廠商間關係、勞工訓練體系、資本市場的結構、國家干預的狀態以及社會正義的概念等等。SSP中的所有組成部分是社會地被建構、脈絡地被定義、為歷史情境所形塑。在每個生產之社會體系的核心是一系列不會轉移到其他社會的具有體系性特殊（system specific）的社會制度，不過在一個國家的生產之社會體系中，可能有一些管理方式、工作組織、政策與踐行是比較容易流動的。

受到「舊制度論」對於制度結構性以及制度之路徑依存概念的影響，Hollingsworth（1997）認為生產網絡的跨界拓展過程的確導致在特定管理方式與工作踐行之部分趨同化，但並未帶來SSP的趨同。跨界生產網絡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的廠商會對其工作踐行作一些修改，一方面參照其自身的SSP之發展路徑，另一方面則選擇性地將部分運作方式整合進入在地的制度安排。每個社會的SSP是開放地接受其他 SSP 的影響，但變遷的方向是受到既有SSP的限制。他強調不同國家的SSP之間仍然有顯著的差異性，在市場、企業階層、網絡、協會和政府之中有著特定的微觀經濟動力。

從鑲嵌論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經濟行動者也是鑲嵌在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中，新的工作踐行的採用一開始是關注在廠商內部的組織模式與生產管理上，當延伸到廠商與廠商之間的關係時（水平與垂直面向），所需要考慮的條件增加，限制面也越大，但在跨界投資時又面臨著劇烈的組織變動與權力關係重組，是否就是一場混戰、無序的物競天擇般的演化？當然母國與投資地的既有制度環境是採用新工作踐行的參考點，組織網絡中的廠商如何運用其個體的所有權優勢以及結合區位優勢加以內部化？這並不只是單純廠商的個體決策而已，而是生產鏈中廠商之間多邊的協調與整合、再穩定化、重新界定發展模式，因此新工作踐行的實施還會牽動到生產網絡中的廠商在跨界投資過程中的自主性與能力資源，有多少程度是可以運用廠商個體的決策而改變組織關係乃至於生產與組織的踐行模式，廠商其實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運用與投資地相關之「區位優勢（L-advantage）」而強化其「所有權優勢（O-advantage）」，乃至於改變在生產網絡中的權力關係與競爭優勢，而被投資地區的制度環境能否提供組織新的調控性功能、不會產生制度鎖死（lock-in）的問題，乃至於可以進一步產生有利於技術創新的規範性與認知性功能就至關重要，這樣的制度重構對於跨界生產網絡的組織運作與分工關係的確立、區域整合都有重要的意義。

六、結論：制度取向之地方發展研究初探

在梳理過經濟地理學界之「制度轉向」這個新研究取向幾個有潛力的研究主題之後，最後我們回到地方發展的角度，初步探討制度取向對於地方發展研究的啟發。首先Amin（1999）曾提出了一套制度主義式的地方發展策略，重點包括（1）藉著提升在地的供應面基礎，動員後進地區內生的發展潛力，（2）強調地方的廠商間協力與互補、協調式的經濟以及會意化的知識技能，（3）鼓勵自下而上、立基於區域特殊性的長期性行動以及多元作用者的行動，（4）強調經濟行為的集體性與社會性基礎，（5）這樣的戰略需要持續的宏觀經濟環境的支持，特別是穩定的財政與收入轉移支付。他認為對於社會制度脈絡與社會鑲嵌的重視可以彌補將報酬遞增引進生產模型中但侷限於正規成長方程式的「內生成長理論（註8）」，使得制度取向可以超越只注重非經濟性之制度性解釋而對實際地方發展有所幫助。

在政策層面上，「制度性綿密」存在與否對於地方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引起了不同學者的關注與辯論，例如所謂的「制度性存在」與否所牽涉到的「制度『綿密』或『淡薄（thinness）』」，Henry and Pinch（2001）就以英國賽車產業為例指出不具有公司部門相關組織所提供的制度性存在與組織網絡，但仍可以發展成為全球經濟中的「新馬歇爾結點（neo-Marshiallian node）」。又如同Raco（1998）所指出，地方性制度綿密的過程遠離地方多元化民主，而朝向（全球）企業家策略的地方行銷（place-marketing）與意象動員（image boostering），制度性綿密係被有限數目的利益團體所驅動，而非作為經濟生活之統合化和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的基礎，如小商人社群、居民社群等團體被邊緣化。

廠商被提供若干有利於發展之制度氛圍的地方吸引時，地方性的社會組織動員與制度化行動變得很重要，但這也將強化區域競爭，各地都競相建構其地方性制度混合（institutional mix）以吸引資本，但地方性制度綿密的建構過程不見得導致經濟成長或地方統合主義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導致地方經濟不穩定、強化地方統理的精英主義形式。因此，首先我們呼應Lovering（1995）對於關注城市政治經濟的觀點，動員鑲嵌在特定地點的社會經濟資源（或者「軟基礎設施」，soft infrastructure）的政治過程本身就應該成為制度取向分析的重點之一，其對於合法化地方精英議程以及對於階級關係的影響等等面向都值得探究，而不僅是「制度性綿密」存在與否，制度取向也必須檢視所謂的制度化過程以及形構它的更廣闊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以及動員地方經濟資源的後果，包括地域競爭、分化、組織破裂化等等。

此外，就有些成功的區域並不具備高度整合的與妥善協調的制度安排，甚至呈現「制度性萎靡（institutional sickness）」這個現象而言，這點出了「制度性綿密」的區域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是制度性地綿密嗎？換句話說，我們認為制度性綿密並不是對於地域經濟發展完全的解釋因子，它本身也需要被解釋。

為避免「軟制度主義」和「制度性基礎主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alism)」可能的套套邏輯，最後我們提出三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面向，首先是國家角色的問題，或者國家性「制度空間」的角色與其轉化，國家本身可以被理解為一組多重尺度之制度形式的結合，也對其他尺度之制度形構與作用產生重大影響，從Lefebvre的角度來說這即是一種空間化了的國家角色作用與「空間干預(spatial intervention)」(Brenner, 1999)，值得從空間化的國家理論乃至於調節取向的疑旨進一步分析，而納入尺度動力(scalar dynamics)的國家性「制度空間」的觀點將有可能強化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另一方面，制度化的社會過程對於地域所具有的社會經濟資源之影響仍須進一步探索，這方面值得參考Saxinian (1994)所提出之「產業體系」三種元素(廠商之內部組織、產業結構或勞動力分工、地方制度與文化)的概念，除了制度組織的角色與制度化過程之外，也考慮到到廠商間關係與其協力合作，並探索廠商之內部結構如何被改變，同時關注於這三種元素之互動以及其歷史性的演化關係，對於掌握地域發展特性將可能提供更全面的理解。第三，如何妥善地處理全球生產網絡與被投資地區之互動關係也值得進一步探究，特別是生產網絡在跨界拓展時其組織治理模式(governance)與企業踐行模式(practice)的轉變，以及被投資地區相關地方性制度的演化過程，從「生產之社會體系」互動或者不同之社會空間互動之角度仔細探討這樣的「策略性接合(strategic coupling)」(Coe et al, 2004)關係將有助於探討為全球經濟所穿透的地方發展之機會與限制。

注釋

註 1：不約而同地這兩位學者都批評了以 Williamson (1985)為代表的新「理性選擇—交易成本」制度經濟學之認識論與方法論。

註 2：社會學領域對制度的角色與制度化的邏輯亦有相當多的討論，可參見葉啟政(1991;1998)。

註 3：關於「尺度(scale)」這個概念在經驗研究上的運用可參見楊友仁、蘇一志(2002)、Cox (1998)。

註 4：如同Qian、Montinola等人提出「市場保護之聯邦主義(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的概念來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政治社會基礎，指出財政制度改革與權利下放對於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強調地方分權以及地方競爭在相當程度上確保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Montinola, etc., 1995)。

註 5：「地域性(locality)」逐漸被認為是由交互作用於不同空間尺度之關係網絡藉著使用、動員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資源所建構起來的，因此研究地方情境中的行動者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關係網絡中的過程便很重要，空間差異的作用在這樣的社會過程中就會產生出來，參見(Murdoch and Marsden，1995)。

註 6：雖然Liptez (1987)曾舉出「邊緣福特主義」、「原始泰勒主義」等不同的積累體制，但不見得這些積累體制就各自對應著特定的調節模式，例如Smart (2000)就認為南中國海的區域經濟體並沒有存在著相對應的調節模式。

註 7：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19-24)提出一個生產之社會體系(SSP)的分類學(typology)，以生產量(volume)、基於品質之競爭的程度、調整的速度為三種軸線，區分出：福特式大量生產、多樣化的品質大量生產(diversified quality mass production)、手工生產(craft production)、彈性大量生產、彈性專殊化等五種生產之社會體系。

註 8：內生成長理論有三個主要變數(1)產生外部性的內生資本投資，(2)產生知識外溢的內生人力資本，(3)熊彼得式的內生研發創新，參見 Martin and Sunley (1998)。

參考文獻

楊友仁　王鴻楷
2001 〈中國大陸內陸城市經濟發展與地方產權體制轉化—涪陵模式的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0：61-87。

楊友仁　王鴻楷　郭健倫
2004 〈快速工業化下的中國大陸區域治理：以蘇州地區土地產權體制轉化為例〉《中國大陸研究》47(3)：111-141。

楊友仁　蘇一志
2002 〈地域競爭與空間政治—臺灣南部科學園區的個案分析〉《地理學報》31：35-81。

葉啟政
1991 《制度化的社會邏輯》台北：東大出版社。
1998 〈「行動」和「結構」的拿捏〉《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26：55-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lchian, A.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211-221.
Amin, A.
1999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3 (2) : 365-378.
2001 "Moving on: 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1237-1241.
Amin, A. and N. Thrift
1994 "Living in the global", in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1-22, ed. A. Amin, and N. Thrif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Globalisation,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the local economy", in Managing Cities: The New Urban Context. 91-108, ed. P. Healey, S. Cameron, S. Davoudi, et al.,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Brenner, N.
1999 "Globaliz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36 (3) : 431-452.
Coe, N.M, M. Hess, H.W.C. Yeung, P. Dicken and J. Henderson
2004 "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29 (Forthcoming) .
Cooke, P. and K. Morgan
1998 The Associational Economy: Firms, Regions and Inno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x, K.
1998 "Spaces of dependence, spaces of engag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or: looking for local 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17 (1) : 1-23.
Dale, B.
2002 "An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o local restructuring: The case of four Norwegian mining towns",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9 (1) : 5-20.
Gertler, M.S.
1999 "The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process: Regions, nation stat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regulation", in The New Industrial Geography: Regions,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s. 225-237, ed. T. Barnes and Gertler,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Best practice? Geography, learn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 limits to strong converg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 (1) : 5-26.
Gilly, J.P. and F. Wallet
2001 "Forms of proximity, local governance and the dynamics of local economic spaces: The case of industrial conversion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3) : 553-570.
Grabher, G.
1993 "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in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al-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255-277, ed. G. Grabher, London: Routledge.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Henry, N. and S. Pinch
2001 "Neo-Marshallian nodes,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Britain's 'Motor Sport Valley': Thick or th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1169-1183.
Hodgson, G.M.
1988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ollingsworth, J.R.
1997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in social systems of production: The cases of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265-310, ed. J.R. Hollingsworth and R. Bo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ingsworth, J.R. and R. Boyer
1997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
2001 "Institutional re (turns) and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1213-1235.
Jones, M.
2001 "The rise of the regional state in economic governance: 'Partnerships for prosperity' or new scales of state powe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1185-1211.
Lipietz, A.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i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
Lovering, J.
1995 "Creating discourses rather than jobs: The crisis in the cities and the transition fantasies of intellecturals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policy makers", in Managing Cities: The New Urban Context. 91-108, ed. P. Healey, S. Cameron, S. Davoudi, et al.,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99 "Theory led by policy: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 New Regionalism' (Illustrated from the case of Wa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3 (2) : 379-395.

MacLeod, G.

2001a "Beyond soft institutionalism: Accumulation, regulation, and their geographical fix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1145-1167.

2001b "New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ic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4) : 804-829.

Martin, R.

2000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in 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77-94, ed. E. Sheppard and T.J. Barnes, Oxford: Blackwell,

Martin, R. and P. Sunley

1998 "Slow convergence? The new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74: 210-227.

Massey, D.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59-69, ed. J. Bird etc., London: Routledge.

Montinola, G., Y. Qian and B. Weingast

1995 "Federi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61-81.

Morgan, K.

1997 "The learning region: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 Regional Studies, 31 (5) : 491-503.

Murdoch, J. and Marsden, T.

1995 "The spatialization of politics: Local and national actor-soaces in environmental confliot", Transaction of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20: 368-380.

North, D.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247-257, ed. M.C. Brinton and V. Ne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R.D.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35-42.

Raco, M.

1998 "Assessing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in the local context: Studies of Cardiff and Sheffiel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0: 975-996.

1999 "Competition, collaboration and the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Studies, 36 (5/6) : 951-968.

Rutherford, M.

1994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xenian, A.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R.

2001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Setterfield, M.

1997 Rapid Growth abd Relative Decline: Modelling Macroeconomic Dynamics with Hysteresis, London: Macmillan.

Storper, M.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Smart, A.

2000 "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s Regions, Polity, &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65-96, ed. S.M. Li and W.S. Ta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ickell, A. and J.A. Peck

1992 "Accumulation, regulation and the geographies of post-Fordism: Missing links in re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6 (2) : 190-218.

Veblen, T.B.

1913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B.W. Huebsch.

Williamson, O.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